

进入网贷行业5年后，黄安决定离开。

2014年，黄安开始在一家著名网贷公司做风控，一年后离职，创办了一家为网贷公司服务的催收公司。巅峰时期，公司一个月能收到几亿元的催收订单，在湖南、贵州等地设有分部，员工超过300人。

但最近两年，与网贷相关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，一些年轻人因无力还贷而自杀或走上犯罪道路。国家出台了严格的监管政策，警方开始大力打击暴力催收、套路贷，“整个行业风声鹤唳。”

2019年4月9日，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《关于办理实施“软暴力”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要求“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准确甄别和依法严厉惩处‘套路贷’违法犯罪分子”。

这些转变成了压垮黄安的最后一根稻草。5月8日，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北五环的一栋写字楼里见到黄安时，两层的办公区域空空荡荡，只剩下三四个人，各地的分部也早已解散。

野蛮生长

在网贷这一行，黄安属于入场较早的一批人。2014年他来北京发展时，网络借贷在中国已存在了7年，但认可、接触它的人还不多。

公开信息显示，2007年，国内第一家P2P网贷平台拍拍贷在上海成立，以信用借款为主。截至2011年底，全国网贷平台只有20家左右，活跃平台不到10家，有效投资人约1万人，成交额约5亿元。

直到2013年，以阿里巴巴旗下的余额宝为代表的网络理财产品诞生，京东白条、蚂蚁花呗等“先消费，后付款”的消费金融产品涌现，网贷才开始进入大众视野。

“好多在银行借不到钱的人是有资金需求的。这是一个新一代的产品、新兴的市场，它的出现对社会是有帮助的。”黄安说，许多民间放贷团体和互联网从业者从中看到了商机。



2018年7月，近400名大学生因未按时偿还网络校园贷被告上法庭。借款前，网贷公司曾要求借款人手持身份证、借款合同等拍照。受访者供图

为了适应技术发展和降低成本的需要，传统的线下获客模式逐渐向线上转移。在百度买竞价搜索广告、去网贷论坛以借款人的身份发帖推广、注册APP返红包等手段极为常见。

余明在某消费金融公司市场部负责运营与获客。他说公司现在主要有三种获客手段：一是从外部买流量，比如在某些APP、应用市场购买广告；二是与B端产品（指面向商家、企业级、业务部门提供的服务产品）合作，比如在贷款超市上架等；三是使用其他网络小贷公司的平台，与他们联合放贷。

“其实还有一些不太正当的获客方式。比如用‘爬虫’盗取其他公司的客户数据。”余明说。2017年，媒体曝光过一款名为“同业爬虫”的产品，只要提供其他网贷平台的用户名和密码，就能获得用户的所有信息。

此外，一些小的网贷公司会在APP名称里加上知名网贷平台的名字“碰瓷”。在应用商店搜索余明公司的APP，前几位都是“碰瓷”的小公司，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就直接下载这些小公司的APP了。

为了拓宽客户群，一些网贷公司还会与其他机构合作，打着培训贷、整容贷等旗号引人上钩。2018年7月，新京报报道过《“704”校花背后：兼职换购面具下的“校园贷”》，文中提到，一家名为“704校花”的网贷公司以“兼职换购”的名义在高校宣传，许多学生出于找兼职、挣零花钱的目的背上了网贷债务。

风控：业内共享的民间征信

并非所有网贷申请人都能还款，要想实现最大程度的营利，风险控制是核心。

一开始，黄安公司的风控方式是为借款人评分，引入学历、性别、地区等参数，再根据过往数据、还款表现，赋予各个参数不同的权重，综合考量。

签合同同时，黄安会亲自到学生宿舍，这能证明借款人的学生身份。他还能与借款人的室友聊天，了解其还款能力、违约风险，“有些宿舍我们进不去，就在食堂或教室签。”

黄安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早期的学生市场数据显示，东北、西北地区的客户违约率比广东、福建低。“可能因为早期南方人接触金融比较多，懂得一些投机取巧的手段。”后来公司进入成人网贷市场，东北的逾期率慢慢被拉高了。“所以这是一个动

态的过程，没有绝对的好区域。”黄安说。

2016年左右，黄安的公司风控方面引入了大数据模型。为了了解借款人的个人状况，他们会要求借款人提供姓名、职业、工作单位、单位地址、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，还要绑定手机运营商、进行身份证实名验证。



西安疑因网贷自杀女孩的父亲，搬到了女儿生前的出租屋，寻找女儿自杀的真相。
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摄

2015年8月，网贷行业迅速发展的时候，黄安从公司离职，和朋友创办了一家催收公司，专门为网贷公司服务。

催收是劳动密集型工作，没有技术含量，“学历高中以上就行”。每招进来一批人，黄安都会安排培训，教授催收“话术”。

“我们常用的催收方式就是打电话、发短信。”黄安说，对于网络小额贷款的借款人，上门催收成本太高，“毕竟欠款一般只有几千块。”

但打电话、发短信也有技巧。催收人会先找借款者本人，不起作用时再打给借款合

同上的“紧急联系人”，极端情况下才会“曝通讯录”——给借款人通讯录里的每个联系人打电话。

对于顽固的“老赖”，催收人打电话前还会在社交平台搜索借款人的单位、亲人住址等信息，并在通话时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借款人，进行心理施压。

黄安给员工讲过这样一个案例：团队催收一单借款时，搜索借款人手机号后发现，其每天都会有一家直播平台直播。催收人组织了几个朋友到直播间刷屏催款，当天晚上，借款人就把钱还了。

“早几年，好多公司会暴力催收，比如在贴吧发借款人照片、骂借款人之类的，回款率就比较高。”黄安说。

借款人受到催收公司暴力骚扰的情况并不少见，有时甚至会让借款人走上绝路。2017年4月，厦门华夏学院的一名大二女生陷入“裸条贷”，累计借款57万元，得知催收人将其裸照发至母亲后烧炭自杀。2017年6月，咸阳大学生小刘在家中自缢身亡，小刘的父亲发现，事发当天小刘的手机收到131条催款短信。2019年2月，西安一名21岁的女孩疑因网贷自杀身亡，去世后，其父接到多个催收电话，收到多条催收人员发送的辱骂信息。

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017年11月，该中心共监测到各类催收平台370个，催收项目188万个，涉及催收资金额1.7万亿元。仅2017年6月至11月，该中心便监测到催收频次1000余万次，暴力催收施害人79万，受害人92万。

严格监管

从2017年年底开始，野蛮生长以致失序的网贷行业迎来严格监管。

当年12月1日，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《关于规范整顿“现金贷”业务的通知》，指出“现金贷”业务中过度借贷、重复授信、不当催收、畸高利率、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十分突出，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隐患。

2018年4月，银保监会、公安部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央行联合印发《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要求“（对）以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、侮辱、恐吓、威胁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民间贷款……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或涉嫌犯罪的行为，公安机关应依法进行调查处理”。

从那时开始，黄安的公司就从“合规催收”变成“温柔催收”了。“我们以前都是

说今天下午必须把钱还了，现在是‘您看今天下午方便把钱还了吗？麻烦您了’。黄安认为，干催收已经变得非常卑微了，“态度稍微强硬一点，就有被投诉的危险”。而借款人一旦在消费投诉平台“聚投诉”上投诉成功，网贷公司就可能追究催收公司的责任。

更严重的是，网贷从业者可能面临的刑事责任，最典型的是网贷中的“套路贷”。

2019年4月9日，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发布了《关于办理“套路贷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《关于办理实施“软暴力”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表示要“持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准确甄别和依法严厉惩处‘套路贷’违法犯罪分子”。

而就在两个月前，公安部发布了打击“套路贷”的相关数据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19年2月，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“套路贷”团伙1664个，共破获诈骗、敲诈勒索、虚假诉讼等案件21624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16349名，查获涉案资产35.3亿余元。

“这两年离开这个行业的人非常多，特别是那些无牌公司的人。”据余明观察，这些无牌公司的盈利数额、客户群体都在急剧萎缩。与此同时，无牌公司还要承担比其他公司更高的融资成本和运营成本。“这些公司本身不合规，现在国家又把它们定性为高息，用户不还钱的概率大幅增加”。

黄安告诉记者，近一个月来，业内绝大多数催收公司都已停业。黄安的公司也没能逃脱倒闭的命运，他在3个月内辞退了所有员工，正在做最后的清算工作。将近一百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鲜见人影，只剩几套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办公桌椅，窗外是破败的城中村。

年过三十的黄安决定彻底离开网贷行业。“这个行业基本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。最后能活下来的，只有很小一部分合规的公司。”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黄安、王玥、余明、李欢为化名）

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吴婕

编辑 滑璇 校对 刘越